符文颖.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一个理论整合的视角[J].地理科学,2016,36(5):715-723.[Fu Wenying. Local Entrepreneurship and Cluster Restructuring: An Integra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2016,36(5):715-723.] doi: 10.13249/j.cnki.sgs.2016.05.009

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一个理论整合的视角

符文颖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要：在辨析地方创业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创业在集群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和方式，并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最新的复杂理论，重点辨析在集群非线性发展过程中地方创业主体与集群结构的反馈过程，其中通过整合经济地理学中制度和关系转向的研究进展，提出必须特别关注在集群转型阶段地方创业主体的能动性，把地方创业过程看作创业家与集群内其他主体之间关系网络的制度–权力实践过程，这个实践过程的目的是为了使得新产业的技术范式和组织范式获得社会合理性，从而提高集群弹性，并促进集群转型和更新。

关键词：地方创业；产业集群；集群转型；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6）05-0715-09

随着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以及经济转型的需要，中国政府从2008年十七大以来就明确提出以创业带动就业的发展政策，并在全国范围内部署规划创业型城市和创业孵化基地。“全球创业观察（Globe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2013年报告指出，中国的全员创业活动指数达到13.5%，是一个创业活动比较活跃的国家[1]。种种迹象表明，创业成为中国产业集群的重要驱动力，创业孵化基地也成为这股新驱动力的空间政策载体。

从19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已开始广泛关注中小型创业企业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领域涵盖经济学、管理学和地理学各个学科。其中，地理学中关于创业的研究相对于其他学科还处于起步阶段，在21世纪初开始才大量涌现，并且主要的分析层面还是集中在中宏观的区域产业结构和地方环境对创业的影响[2~5]。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产业集群的创新导向及其相应的技术和制度转型，自1990年代末开始就受到国内外学者普遍的研究关注[6~8]。然而，在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中，地方创业在集群转型这一特定阶段中的作用机制都未能得到充分的阐释。创业企业针对产业集群在转型期的制度锁定和技术锁定的应对，它们之间及其与地方主要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和网络的集群变革动力的形成等等问题都缺乏系统地、综合地考虑，这不仅将限制对产业集群转型微观层面的机制理解，在实践层面也不利于公共研发政策对集群长远有效的促进作用。由此，本文在辨析地方创业概念和内涵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整合经济地理学中演化、制度和关系转向的研究进展，梳理经济地理学中关于地方创业在集群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和方式，并重点论述了集群转型过程中地方创业与集群结构的反馈过程，提出必须特别关注在集群转型阶段地方创业主体关系网络的制度权力实践，最后展望在中国情境下基于地方创业视角研究集群转型的前景和方向。

1 地方创业的概念与内涵

创业是指创办事业的行为和过程，即发现经济机会并在市场中引入新想法[9]。OECD对创业的定义为“创业家是市场经济中变革的推动者，通过积极行动加快创新想法的产生、传播和应用[10]。创业家不仅寻找和识别潜在的经济机会，同时愿意承担

收稿日期：2015-07-13；**修订日期**：2015-10-2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01109）、国家973计划前期研究专项项目（2014CB460614）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301109), Special Prophase Project for National Basic Research Program of China (973 Program) (2014CB460614).]

作者简介：符文颖（1984–），女，海南海口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产业集群和区域创新研究。E-mail:fuwenying@m.scnu.edu.cn

风险以检验其直觉是否准确”。狭义的创业研究主要关注新创企业，基于“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新创企业界定为“由企业家独立创建的、成立时间不超过42个月的新企业”[1]。新创企业主要有3种类型：1）现有企业范围化拓展经营过程中新建立的多样化子企业；2）由现有企业或机构原有员工建立的衍生企业，母体企业对其可以构成持股关系或单纯的市场关系；3）由不具有产业工作经验的创业者，如毕业生或科研人员成立的新生企业。

在狭义的创业研究中，隐含着创业能够提升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设。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开始，创业家是进行“创造性破坏”和“创造性建设”的主体[11]，因此创业的内涵被默认为是具有革新性和开创性的[12]。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初创企业都基于机会发掘的初衷开始创业历程。随着创业研究向发展中国家的深入，发现创业在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创业的主要形式更多的为生存型创业（necessity entrepreneur）。与机会型创业和高增长型创业受到机会和创新驱动不同，生存型的创业者往往选择风险比较小的现有市场，也被称为“贫穷推动型创业”[13]。Baumol早就指出[14]，并不是所有的创业家都具有创新性和破坏性，甚至可能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寄生组织领导人，而经济系统中高效企业家的比例取决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游戏规则和激励框架。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科技初创企业往往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在区域创新系统概念下新发展的区域创业系统研究，也主要关注知识型创业活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3]。因此，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中，创业的概念往往更多针对的是具有高增长潜力的新创企业[13]。

基于以上观点，创业的内涵得以从狭义的初创企业向广义的创业导向概念延伸。创业导向（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也称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导向等）型的企业参与产品创新，承担一定的风险，并进行超前性的创新[15]。创业导向型企业强调组织和员工的创新和风险承担态度，同时，这种企业文化对企业绩效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外部网络协同能力[15]。在强调创业概念中革新和能动性的基础上，创业研究得以从原有的经济领域向社会、文化和制度领域拓展，由此产生了诸如制度创业家、社会创业家等新概念。尽管具有不尽相同的内涵，这些广义的创业概念都同时强调人的能动性，及其使得新的制度和社会文化获得合理性的过程。在这个创造性的实践过程中，广义的创业家根据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动用权力、资源和社会网络，并通常以渐进影响和合作网络的方式，达到变革的目的[16]。

从以上对创业的狭义和广义概念阐释中可以发现，创业与当代地理学中普遍关注的社会网络和制度等概念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对于企业进入、竞争以及学习来说，区域尺度的分析比国家尺度更加合适[17]，相关学者对此提出了创业的区域尺度研究，使得地方创业概念得到了广泛应用。尽管目前还缺乏一个统一明确的概念界定，从不同学者对地方创业的研究中，可以发现3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创业活动的产生和发展高度依赖于区域条件，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4]，本地化产业经济[5]，本地机构密度[2]，人力资本存量[3]，以及特定的区域文化[18]等；二是创业活动对于经济系统的影响更多的发生在区域层面，表现在提高区域劳动生产率[12]，塑造本地产业集群[19]，以及促进本地化知识溢出机制[20]。相对于现有企业，新创企业更能够识别新的市场或者技术机会，由此更能发掘区域独有的比较优势。尽管新创的年轻企业发展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存活的年轻企业往往比现有成熟企业具有更大的增长潜力[21]；三是创业家及其网络的能动性实践更多的发生在本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新创企业主要来自于本地企业和机构的衍生，因此创业资源和网络具有地方根植性[22,23]，创业家们在本地共同的工作经验（同事，供应商和客户等）而建立起信任感，又熟知本地产业发展而能形成对未来发展共同的预期和目标[24]。综合以上研究，本文将地方创业界定为创业活动在区域条件的驱动下发生和发展，并反过来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现象，也是创业家在地方尺度上以社会网络的方式集体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能动性实践过程。

2 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关系辨析和分析框架

2.1 地方创业在集群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方式

为了更好的厘清地方创业在集群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和方式，参考Menzel等[25]对集群生命周期的界定，将集群演变分为3个主要阶段：集群形成、集群发展和集群转型，阐释地方创业在不同集群发展阶段的作用与方式。

在集群形成阶段，新产品还未形成稳定的技

术范式,大量新企业活跃于集群经济中,其经营范围的多样性使得集群具有较大的弹性,从而较好抵抗外部环境改变带来的冲击[26]。然而,集群关键性群体的形成有赖于企业之间基于学习交流达成一定的技术共性和协作,因此,具有相关产业工作经验的企业家创业以及多样化子企业是新产业在地方发展的启动机制[27]。同时,新产业同时也受到新市场、技术范式和制度共同的影响,因此在新产业萌芽期,区域仍然享有一定的"区位窗口机会",而个别成功创业家在地方出现的随机性也使得集群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偶然性[28]。

在集群发展阶段,地方创业中的企业衍生-遗传机制可用于解释集群的迅速成长,即经过市场和技术选择的成功企业不断衍生出遗传其部分能力的企业,而衍生企业临近母体企业的区位选择策略,最终促成产业集群的成型和集群网络的相对稳定[29]。总的来说,产业集群形成和壮大阶段的主导机制更多来自于成功企业"滚雪球"式的衍生和示范效应,马歇尔式的集聚经济优势在集群发展成熟阶段才开始显现[30]。集群经济提高了新创企业的存活率以及通过兼并方式成功退出的几率,然而从资源导向的观点出发,集群经济对创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现有相关企业的集聚,而集群内过高的新企业进入率则会提高对有限资源的竞争强度,从而抑制创业的成功[5]。从地方创业的角度来看,集群优势降低了新企业的进入门槛,而当自主创业和员工衍生成为集群常态时,技术和信息外溢的风险增加,又会使得企业间和企业内的信任感降低,从而减弱了集群本地化知识交流的正向机制[31]。Menzel 等的集群周期模型将企业间异质性作为集群演化的内生机制,提出集群发展悖论(cluster paradox),即企业间异质性在集群发展过程中随着企业衍生机制、共有技术范式的发展以及生产创新网络的建立而逐渐减小,一方面专业化分工增加了产业内企业间相互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加剧了竞争,并且降低了学习溢出的程度[25]。因此在专业化的集群建立起来后,容易造成锁定和适应力低的情形,在经济转型期具有较大的脆弱性。

在集群面临衰退或者更新转型过程中,Neffke 等基于一个演化的理论框架构建了技术相关性(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的概念[26],指出与原有企业技术相关的新企业衍生发展可促进集群的转型升级,是集群弹性在面对外部危机时的重要体现。由此可见,具有相关多样性(related diversification)的产业结构有助于区域转型[26]。然而,单从区域结构的视角看待创业现象不免陷入结构决定论的桎梏,实际上,创业企业和创业家们如何重组集群的资源和知识,以及如何打破地方原有的社会网络和制度机构锁定,也应成为创业研究的重点。在这一方面,广义的创业研究中所提出的制度创业家和社会创业家等概念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进而强调企业家个体对宏观经济社会结构的能动性塑造过程。因此在集群转型阶段,创业主体在市场、制度和社会综合层面的能动性行为是促进集群技术和制度转型的主要方式。

2.2 理论整合视角下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关系

2.2.1 演化视角下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的关系辨析

地方创业研究应借鉴演化经济地理中最新的复杂理论,而非机械线性的集群发展理论,才能更充分理解地方个体与区域结构复杂的地理互动过程。也就是说,集群发展并非遵循简单的线性逻辑,而是受到时空偶然性、企业异质性和主体能动性的影响。借鉴生态学中复杂理论的系统空间尺度特征思想,复杂理论将集群看作复杂适应系统[8]。据此,典型的4个产业集群适应演变阶段为开发-平稳-释放-重组,并伴随着程度各不相同的区域弹性,联结度以及地方资本积累(释放)速率。Martin 等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更多集群非线性路径的可能,包括集群在快速技术变革下的持续变异、集群通过渐进创新维持长期稳态,或者集群的自我调整更新过程[8]。在集群的非线性发展过程中,新路径的创造往往依赖于突变性的外部事件[32]。外部市场和技术的冲击通过释放旧有部门的人才和资金,从而为在新市场和技术领域的创业活动提供了增长机会。演化经济地理中的复杂理论流派重视微观层面上的行动者(agent)行为及其目标对集群发展的作用[33,34],认为行动者在集群既定的产业和制度框架内,识别集体行为的潜在利益,并就此有目的地创造新的发展路径。企业和机构的集体行为塑造了集群的空间结构和过程,而集群的结构特征又同时影响微观个体的行为和绩效,由此,集群作为具有各种反馈和自我加强机制的非线性系统,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动态性。

总的来说,在地方创业视角下研究产业集群的演化发展,与单纯集群演变发展的概念有所区别,应着眼于从静止片面的集群研究范式转向微观主

体对集群结构和机制的动态性构建过程的研究，在分析变化的同时也注重集群技术和制度的遗传性，强调地方创业所衍生出的多样性对部分旧机制的强化发展以及对新机制的创新发展。复杂理论认为，在集群的转型阶段，原有利益格局被打破或重组，并出现更多的市场和技术变革机会，其经济和制度结构对于自下而上的行动者实践最为敏感。因此，这一阶段是产生变革和创新的窗口时期[8]。

2.2.2 制度视角下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的关系辨析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由于外生因素的变化促成了潜在利润的形成，而这些潜在利润无法在既定的现有制度安排内实现，某些人或群体为了获取潜在利润，就会率先克服这些制度障碍，进而导致制度创新，形成制度变迁[35]。因此，制度与演化总是紧密联系的，不确定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制度的产生和变化就是为了适应这种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并获得经济活动的盈利。

然而，外生因素仅仅是创新型创业企业和创业家发展的催化剂，集群转型的成功主要依赖于区域内生因素如政策激励和创业文化环境等。Simme 等运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比了英国剑桥和斯旺西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发现两地在英国两大经济衰退期间所表现出的不同区域弹性主要来自于地方创业水平的差异[36]。剑桥的地方创业不断受到大学开放的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发，并获得大学高新园区孵化器的支持，而斯望西过度依赖于日资电子企业生产模式和地方保守的创业文化，导致其在宏观经济衰退中具有较低的恢复能力。Parthasarathy 等对印度邦加罗尔软件业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在公共研发部门和跨国企业的人力资本库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的本土创业家，及其与大型印度企业和印度侨民致力于创建的“技术社区”是本地低端软件业向高端研发活动转型的关键要素[24]。这些研究成果都表明，在应对外部危机和内部压力的情况下，产业集群的成功转型升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公私部门主动的制度构建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地方创业机制。可见，制度不是区域和集群发展的先决因素，而更多的是作为个人和组织行动的指南[37]。

2.2.3 关系视角下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的关系辨析

关系视角与制度视角的关联在于制度变迁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在于新制度的建立需要也必须寻求社会合理化[38]。在制度创业理论中，制度是约束集体思维和社会行动的规则，新制度的出现需要形成对应的支持群体，这些制度创业家群体挑战现有制度规范，并共同强化新制度的社会合理性[39]。所谓的社会合理性，即是指行为在社会所构建的规范和价值系统下被视为合乎需要和合乎情理[39]。因此，创业家的对集群既有范式的创新必须通过其所在的关系网络获得认可度和影响力。

关系网络的内在张力是集群转型的内生动力，这种张力可以来自于竞争淘汰、集聚经济（不经济）、集群内技术同质性降低或者社会网络的锁定。与内在张力相对应，集群外界环境，如市场和技术环境的改变，将促使行动者实践其在关系网络中的相对权力，并在制度框架的调节下形成最终的空间经济结果[40]。Sotarauta 等对地方创新系统中制度创业家的理论框架里进一步指出，网络权力（network power）可在新制度建立过程中建立共识和协同行动[16]。具有网络权力的行动者拥有召集其他行动者的资源和能力，并消除各个行动者之间的沟通障碍，与之共同制定计划，解决纠纷，促进信息流动，建立信任，从而最终称贤使能。同样，在 Yeung 所构建的关系几何分析框架中，权力（power）作为集群演化最关键的解释变量，表现为行动者在现有制度约束下影响结构变革的资源和能力，以及这些资源和能力经过社会集体实践后共同产生的效果[41]。制度的形成过程往往是某些产业的创业家关键群体（critical mass）成长后形成特定关系网络并合力的结果[42]，而新产业的增长又通过其所形成的制度框架进一步得到强化，从而实现产业集群的转型发展。并且，地方创业主体并不是孤立的推动集群变革，而是与现有企业、地方政府、以及区域中介服务机构的关系几何中进行能动性的权力实践，从而共同影响产业集群的发展。

2.3 理论整合视角下创业企业和创业家异质性特点

创业企业不仅仅依赖于本地环境，其主动战略行为也同时重塑地方集群环境。创业企业对集群经济弹性和适应能力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创造和引入资源和制度的能力，以及创业家网络或群体对地区市场结构的改变[43]。创业企业和创业家是具有异质性的个体或群体，其与集群结构的互动关系也有多种表现形式，并对新路径的产生起到重要作用。

从关系和制度视角出发，创业企业和创业家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产生背景对其网络能力和制度能力的影响。以创业家的产业经验为依据，可

以将创业企业分为衍生企业(Spin-off和Spin-out)和新生企业(Start-up)。作为现有企业或机构的新组织,衍生企业是集群发展的重要驱动力[44]。相对于新生企业,创业家创业前所建立的商业和社会网络使得衍生企业可获得较大的增长潜力[45]。在集群转型期,这也能赋予衍生企业相对于新生企业较大的网络能力和能动性。另一方面,衍生方式和背景决定了不同类型衍生企业的网络强度和广度。母体组织持有一定份额股权的衍生企业往往为主动衍生,因此相对于被动衍生型企业与母体组织有较大的资源和能力协同关系。然而,与母体组织的网络联系有时不仅不会促进衍生企业变革和创新,相反还会使其进入组织锁定过程,譬如社会网络的局限性以及对成功模式的近视性学习效仿,更多地复制现有的组织范式和商业实践[46]。

学术衍生企业,即由大学或研究机构的教授和年轻研究人员开创的企业,在知识经济背景下也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特别是在电子产业和生物医药产业领域。然而,学术创业家的学术目标导向通常使其不能充分的参与市场[47],因此更多的充当集群变革的发动者而不是持续推进者[16]。在资本市场活跃并且创业文化包容的区域,连环创业家(serial entrepreneur),即有多次成功或失败创业经验的创业者,往往相对首次创业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导向[48],由此更能够为集群引入新的技术和组织范式。在转型经济体中,政府是制度变革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推动者。相比于东欧和独联体转型经济体,中国活跃的创业现象和薄弱的制度环境形成强烈的对比,并挑战传统的创业制度范式。Yang提出双重企业家(double entrepreneur)的概念[49],其双重性体现在其同时活跃在经济以及社会政治两个领域,他进一步指出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漏洞与中国政治体制特点的结合,使得双重企业家通过与政府的不断协商,寻找市场创业机会,这是解释中国创业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地方分权的背景下,双重企业家的制度和市场实践主要集中在地方层面,同时中国政策制定的实验性特点,地方官员晋升的激励促使其与富有创业进取精神的企业家形成紧密的关系网络,并赋予了双重企业家较强的制度能力,共同探讨市场经济转型的区域示范模式。

2.4　地方创业在集群转型中能动性实践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在具体的地域空间层面,复杂理论下的集群演化理论与经济地理的制度转向和关系转向相呼应,都共同关注地方基层的行动者,如企业、机构和员工之间的关系网络与相对稳定的制度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于空间经济的影响结果。

图1总结了集群复杂演化的基本框架下地方创业主体和集群结构的反馈过程。其中,关系和制度的分析视角整合对于理解地方创业驱动下的产业集群转型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集群转型阶段,应把地方创业过程看作创业家与集群内其他主体之间关系网络的制度-权力实践过程。这个社会实践过程的目的是为了使得新产业的技术范式和组织范式获得社会合理性,从而提高集群弹性,并促进集群转型和更新。通过重视创业主体的关系网络在制度框架下的动态性,如不同类型的创业企业的产品和市场战略对集群产业链提升的作用,创业家对于集群在转型期的制度锁定和技术锁定的应对策略,以及地方创业主体与地方主要行动者,如政府、跨国企业及主要机构之间的互动和网络是如何形成集群变革的动力等,可加强对产业集群演化机制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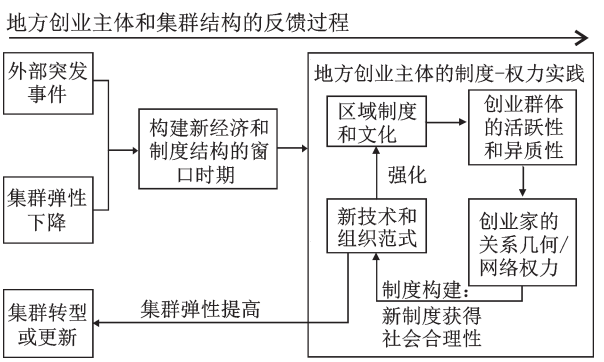

图1　整合视角下的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的关系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entrepreneurship and cluster restructuring under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3　中国情境下的地方创业与集群转型研究与展望

改革开放后,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产业集群迅速在中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并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区域引擎。国内学者在寻求中国式集群发展的理论构建过程中,充分认识到西方集群理论与中国现实的偏离,

除了基于知识和技术联系的集聚经济在个别区域作为集群发展的主要动力[50],政府和跨国企业也在集群发展中扮演更重要的主导地位[51,52]。然而,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以及中国对创业政策的大力支持,国内学者也注意到了地方创业机制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在中西部传统制造业集群内,地方创业普遍通过泛家庭网络的企业衍生和裂变机制发生[53],而在较为发达地区的产业集群内,地方创业机制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各种创业职能机构如商业协会、孵化器、官产学网络等是制度与产业共同演化的产物[54],跨国企业和本土代工企业的衍生功能在集群的产业价值链升级中具有重要作用[55],而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高校衍生企业和海归人才创业也迅速成为国家人才政策背景下兴起的内生地方创业机制。由此可见,在中国创业主体趋于多样化的背景下,本文所提出的创业主体异质性及其特定的能动性实践过程,对于理解中国各区域发展和集群转型的机制具有较大的意义。

同时,随着中国市场体制的转型,企业家在集群发展中的主体能动性越来越大,如吕文栋等[56]的研究发现地方企业家的行为会通过其关系网络对产业集群的资源分配效率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也有较多中国集群的研究关注政府和制度环境与地方创业的互动,如苗长虹等[57]将河南花木产业集群创业家的兴起归因为地方政府创造的制度环境与发展中的市场环境共同推动下的知识创造过程,符文颖等[58]指出深圳改革试验田的制度先发优势,较大的激发了地方创业和民企创新,从而相较于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东莞更顺利的从工业基础薄弱地区向区域创新系统转变。可见,地方创业主体与地方及全球网络和制度的互动关系,已逐渐得到地理学者的关注。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产业集群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动态性,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可以整合不同学科领域(地理学、管理学等)以及不同理论视角,从地方创业主体的特定角度出发,分析不同类型集群转型的空间过程。

在以制度转型、开放与全球化以及技术后发优势等为特征的中国情境下,地方创业主体在集群转型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具有极强的动态性和多样性。基于地方创业主体的集群转型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层面的内容,可供未来中国产业集群转型的深化研究:

1)中宏观层面的地方创业研究

在新常态的经济转型背景下,随着资本和人才向新的产业领域转移,新企业和创业家群体将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在金融危机后,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东部沿海集群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与单纯地方创业驱动的内陆地区产业集群不同,地方创业在东部集群内的作用机制是复杂交错的,体现在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和转型路径的多样性上。地方创业主体在不同集群的异质性,会与其他集群主体形成特定的内部权力结构和博弈格局,影响到新一轮发展路径产生的制度成本,因此,基于不同类型的地方创业主体在特定产业集群环境下的战略能动行为的比较研究,将有利于揭示地方创业对沿海地区产业集群转型机制。

2)微观层面的地方创业研究

当前中国大力鼓励创业,并主要通过建立创业园区和创业孵化器等空间载体的方式推行,同时资本市场的积极响应也塑造了创业公寓、创业咖啡馆、创业街区等新型城市空间。地方创业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可通过微观实体社区的建立加强信任感和认同感,这也是影响其在中宏观层面与其他集群主体权力实践的重要基础,因此,研究地方创业社区及其空间生产逻辑,将有助于深化理解地方创业主体关系网络建立和实践的空间机制,从而为建设创业园区和孵化器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议。

4 结论

创业活动是典型的地方现象,对于特定产业在地方的集聚发展而言,地方创业是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新企业的创立和绩效既受到集群环境的影响,反过来又能够不断改变产业集群内的生产边界和网络性质。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转型,企业家正与跨国企业和地方政府一起成长为集群发展的重要主体,通过引进新的组织范式和产品范式对集群的发展转型产生积极的建构作用。由此,本文在整合演化、制度和关系视角的基础上,提出地方创业在集群转型中能动性实践的分析框架,有助于从微观作用机制层面完善当前产业集群的研究,在中国特定的转型体制下揭示中宏观尺度的集群结构和制度框架与微观尺度上地方创业主体实践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期弥补当前经济地理学对于转型经济的微观个体行为研究的不足。在政策建议方面,微观层面的分析框架也有助于提出经济和产业转型的

新思路,识别对产业集群转型具有积极建构作用的优势创业群体和人才,以期提供更具有地方和群体针对性的政策性建议。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Amoros J E, Bosma N.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GEM) 2013 Global Report[R/OL]. http://www.enterprise-ireland.com/EI_Corporate/en/News/PressReleases/2014-Press-Releases/Global-Entrepreneurship-Monitor-GEM-Report-2013.html,2014.

[2] Casper S. How do technology clusters emerge and become sustainable? Social network formation and inter-firm mobility within the San Diego biotechnology cluster[J]. Research Policy, 2007, 36(4): 438-455.

[3] Qian H, Acs Z, Stough R R. Regional systems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nexus of human capital, knowledge and new firm form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3, 13(4): 559-587.

[4] Hundt C, Sternberg R. Explaining new firm creation in Europe from a spatial and time perspective: A multilevel analysis based upon data of individuals, regions and countrie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4, doi:10.1111/pirs.12133.

[5] Weterings A, Marsili O.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es and New Firm Exits: Does this Relationship Differ between Exits by Closure and by M&A?[J]. Regional Studies, 2015, 49(1): 44-58.

[6]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8, 76(6): 77-90.

[7] Bathelt H, Malmberg A, Maskell P. Clusters and knowledge: local buzz, 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4, 28(1): 31-56.

[8] Martin R, Sunley P. Conceptualizing cluster evolution: Beyond the life cycle model?[J]. Regional Studies, 2011, 45(10): 1299-1318.

[9] Gartner W B.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90, 5(1): 15-28.

[10]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R]. Paris: Fostering Entrepreneurship.

[11] Schumpeter J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12] Audretsch D, Keilbach M. Entrepreneurship capit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 Regional Studies, 2004, 38(8): 949-959.

[13] Wong P K, Ho Y P, Autio E.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GEM data[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5, 24(3): 335-350

[14] Baumol W J.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e, Unproductive, and Destructive[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5): 893-921.

[15] Walter A, Auer M, Ritter T. The impact of network capabili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on university spin-off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6, 21(4): 541-567.

[16] Sotarauta M, Musitikkamaki N.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power, and knowledge in innovation systems: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 Tampere, Finland[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015, 33(2): 342-357.

[17] Fritsch M, Schmude J.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Region, ISEN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Entrepreneurship) [M].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2006.

[18] Aoyama Y.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culture: The case of Hamamatsu and Kyoto, Japan[J]. Regional Studies, 2009, 43 (3): 495-512

[19] Yan H D, Kuo Y C, Chen S Y. Entrepreneurship and an Apprentice-based Cluster: The Evolution of Houli's Saxophone Cluster in Taiwan[J]. Global Economic Review, 2011, 40(4): 483-502.

[20] Acs Z, Armington C. Employment Growth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Cities[J]. Regional Studies, 2004, 38(8): 911-927.

[21] Barteisman E, Scarpetta S, Schivardi F.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irm demographics and survival: evidence from micro-level sources in OECD countrie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05, 14(3): 365-391.

[22] Audretsch D, Keilbach M. The localization of entrepreneurship capital: Evidence from Germany[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07, 86(3): 351-365.

[23] Kenny M, Patton D. Entrepreneurial geographies: Support networks in three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05, 81(2): 201-228.

[24] Parthasarathy B, Aoyama Y. From software services to R&D services: local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software industry in Bangalore, Indi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7): 1269-1285.

[25] Menzel M P, Fornahl D. Cluster life cycles. Dimensions and rationales of cluster evolution[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0, 19(1): 205-238.

[26] Neffke F, Henning M, Boschma R. How do regions diversify over time? Industry related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growth paths in regions[J]. Economic Geography, 2011, 87(3): 237-265.

[27] Klepper S. Nano-economics, spinoffs, and the wealth of regions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1, 37(2): 141-154.

[28] Boschma R A. New industries and windows of locational opportunity. A long-term analysis of Belgium[J]. Erdkunde, 1997, 51 (1): 12-22.

[29] Dahl M S, Sorenson O. The embedded entrepreneur[J].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2009, 6(3): 172-181.

[30] Arthur W B.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M].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31] Staber U, Sautter B. Who are we, and do we need to change? Cluster identity and life cycle[J]. Regional Studies, 2011, 45 (10): 1349-1361.

[32] Bathelt H, Boggs J. Toward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hs: is Leipzig's media cluster a continuation of or a rupture with the past?[J].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79 (3): 265-293.

[33] Henning M, Stam E, Wenting R. Path dependence research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acophony or knowledge accumulation?[J]. Regional Studies, 2013, 47(8): 1348-1362.

[34] Sydow J, Lerch F, Staber U. Planning for path dependence? The case of a network in the Berlin-Brandenburg optics cluster[J]. Economic Geography, 2010, 86(2): 173-195.

[35]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6] Simmie J, Martin R.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of regions: towards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2010, 3(1): 27-43.

[37] 吕拉昌, 魏也华. 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制度转向与区域发展[J]. 经济地理, 2005, 25(4): 437-441. [Lv Lachang, Wei Yehua. Institutional turn,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Economic Geography, 2005, 25 (4): 437-441.]

[38] Allen J. Lost Geographies of Power[M]. Oxford: Blackwell, 2003

[39] Pacheco D F, York J G, Dean T J et al. The co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 tale of two theori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0, 36(4): 974-1010

[40] Rafiqui P S. Evolving economic landscapes: why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atters for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9, 9(3): 329-353.

[41] Yeung H W. Rethinking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05, 30 (1): 37-51.

[42] Stam E, Lambooy J. Entrepreneurship, knowledge, space, and place: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meets Austrian economics[M]//Andersson D. The Spatial Market Process. Bingley: Emerald, 2012: 81-103.

[43] Sammarra A, Belussi F. Evolution and relocation in fashion-led Italian districts: evidence from two case-studies[J].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006, 18(6): 543-562.

[44] 马力, 臧旭恒. 企业衍生研究述评[J]. 管理学报, 2012, 9(12): 1869-1874. [Ma Li, Zang Xuheng. Spin-off: A Literature Review.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9(12):1869-1874.]

[45] Agarwal R, Echambadi R, Franco A M et al. Knowledge transfer through inheritance: Spin-out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survival[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4, 47(4): 501-522.

[46] Staber U. Entrepreneurship as a source of path dependency[M] // Fuchs G et al. Rethinking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change: Path dependency or regional breakthrough. New York: Springer, 2005: 107-126.

[47] Harrison R, Leitch C. Voodoo Institution or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Spin-off Companies, the Entrepreneurial Syste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UK[J]. Regional Studies, 2010, 44(9): 1241-1262.

[48] Westhead P, Ucbasaran D, Wright M. Differences between private firms owned by novice, serial and portfolio entrepreneurs: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and practitioners[J]. Regional Studies, 2003, 37(2): 187-200.

[49] Yang K.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M]. Aldershot UK: Ashgate, 2007.

[50] 千庆兰, 陈颖彪, 董晓敏.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与创新环境的实证研究——基于广东省 785家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J]. 地理科学, 2008, 28(4): 488-495. [Qian Qinglan, Chen Yingbiao, Dong Xiaomin. Technology innovation within small and middle enterprises and regional environment.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8, 28(4): 488-495.]

[51] 王琛, 林初昇, 戴世续.产业集群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J]. 地理研究, 2012, 31(8): 1375-1386. [Wang Chen, Lin Chusheng, Dai Shixu.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hina's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2, 31(8): 1375-1386.]

[52] 吕拉昌, 余国扬, 高晶华,等. 地区全球化的一种新模式——以广州狮岭镇皮具产业为例[J]. 地理科学, 2009, 29(3): 336-341. [Lv Lachang, Yu Guoyang, Gao Jinghua, etc. Emerging model of local globalization: case study of Shining leather industry.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29(3): 336-341.]

[53] 李二玲, 李小建. 欠发达农区传统制造业集群的网络演化分析——以河南省虞城县南庄村钢卷尺产业集群为例[J]. 地理研究, 2009, 28(3): 738-750. [Li Erling, Li Xiaojian. The evolution of networks i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clusters of undeveloped rural areas: The case of steel measuring tape cluster in Nanzhuang village, Yuche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28(3): 738-750.]

[54] 李国平, 孙铁山, 卢明华. 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过程及其影响因素[J]. 地理学报, 2003, 58(6): 927-936. [Li Guoping, Sun Tieshan, Lu Minghua. A study on th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eijing's hi-tech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3, 58(6): 927-936.]

[55] 文娉, 杨友仁, 侯俊军. 嵌入性与FDI驱动型产业集群研究——以上海浦东IC产业集群为例[J]. 经济地理, 2007, 27(5): 741-746. [Wen Hu, Yang Youren, Hou Junjun. Study of embeddedness and FDI-driven industrial cluster: Case of Pudong IC industrial cluster.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27(5): 741-746.]

[56] 吕文栋, 朱华晟. 浙江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基于企业家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05, 4:86-93. [Lv Wendong, Zhu Huasheng. Industrial cluster dynamics of Zhejiang: Perspective from entrepreneurs.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5, 4: 86-93.]

[57] 苗长虹, 魏也华.分工深化、知识创造与产业集群成长——河南南鄢陵县花木产业的案例研究[J]. 地理研究, 2009, 28(4): 853-864. [Miao Changhong, Wei Yehua. Deepening division of labor, knowledge creation and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 case study of the flowers and plants industry in Yanling Coun-

ty, Henan Province,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9, 28 (4): 853-864.]

[58] 符文颖, Revilla Diez J, Schiller D.区域创新系统的管治框架演化——来自深圳和东莞的对比实证[J]. 人文地理, 2013, 28 (4): 83-88. [Fu Wenying, Revilla Diez J, Schiller D. Evolving governance framework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henzhen and Dongguan. Human Geography, 2013, 28(4): 83-88.]

Local Entrepreneurship and Cluster Restructuring: An Integrativ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u Wenying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ial agents for evolutio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mechanisms of industrial cluster restructuring is particularly use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bottom-up constructing process of restructuring.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n the content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concept definition of local entrepreneurship, this article proceeds with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entrepreneurship and cluster evolution. In the cluster formation phase, new firms relying upon the similar working experiences and diversifying firms are the critical mass owing to opportunities of interactive learning. In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phase, localized spin-off dynamics account for the rapid expansion of existing industries. When the cluster matures, the cluster paradox emerges.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boo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ncumbent firms, but meanwhile increases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between new firms and the risk of spillover. In this case, specialized clusters tend to enter the phase of lock-in in particular in face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dustrial structures with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helps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clusters. However, the structure-determined view tends to overlook the agency of economic actors. Complex theory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views cluster development as a non-linear process in arguing that the decline of clusters is not inevitable and clusters can be upgraded and restructured with new technology or new resources. Relying on the complex thinking in resilience theory, it highlights the new path creation as processes triggered by external shock events, and are jointly formed by existing socio-cultural environment for new business and active initiative taken by the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networks. The article tries to integrate the rel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local entrepreneurship as a power practice to legitimize new institutions for new technologies, which is placed in the relational geometries with other cluster agents, such as the local government, global lead firms and related institutes. It is argued that research attention on entrepreneurial attributes and background, as well as their network power is critical for the understandings on cluster evolution mechanism. Last,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studies on entrepreneurship-driven cluster restructuring within the China transition context is put forward. Firstl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should acknowledge the strategic initiativ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entrepreneurs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milieus and regional circumstances. The interaction and network between local entrepreneurs and other cluster agents should become the research focus in studies of Chinese coastal regions in times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Secondly, focus on the micro-scale entrepreneurial space should be placed in order to shed light on policy implica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rt-up parks. The entrepreneurial communities have been rapidly emerging as one of the new urban space in China, which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trust and sense of identity, and forms the pivotal base for the power practice of the entrepreneurs with other agents.

Key words: local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ial cluster; cluster restructuring; relational networks